

# 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 学术研讨会综述

唐 小 林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2004年6月28日至30日,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承办方四川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5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消费时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若干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 一 语境变迁与学术取向

消费化、全球化所致的社会转型与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语境变迁,以及应运而生的全新的问题意识、学术取向,是本次研讨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章国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对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的清理,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是对消费时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新语境的描述。消费社会导致了人的本质的歪曲、社会等级结构的变动以及文化文本和商品的相互占有。人成了商品消费和无休止的物欲追求的奴隶;在货币和商品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后面是身份、地位、人格、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的等级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变成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以致于商品的泛文化化和文化的泛商品化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文化特征。电子信息技术的完善和因特网的出现,标志着文字文化最终丧失支配地位并可能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的开始,在这时,一切文化样式都应该被理解为媒介的形式化

和形式的媒介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由此改变和更新着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样式,也改变和更新着衡量文化和文学艺术的标准。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问题意向就是:东方消费主义话语中的文化语境以及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学术关怀。据社会学调查,当下中国具有消费主义倾向的人占77.3%,消费社会已然来临。他对此引发的四个文化问题进行了审理:一是准资产阶级的浮升与消费政治的凸现,二是东亚消费主义背后的西方文化意识形态进入,三是消费主义“身体”扩张与全球同质化潜在逻辑,四是媒体平台在消费主义文化中的正负面意义。他的文化焦虑是,伴随消费主义时尚在中国的挺进,当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谁可以对这种消费主义现象和这一社会运转机制和存在的问题加以真正的反省?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抬升消费主义文化和身体文化,而是尽可能倡导“文化大国”、“文化大省”、“文化大县”,真正建立中国在国际上的重要身份。在消费主义时代潜在资本逻辑中,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到了面对跨国话语重塑“中国文化形象”的时刻了。

曹顺庆(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对王岳川提出的重塑“中国文化形象”问题,近十年以来已有具体的推进,他及他所在的学术群体先后提出文论

收稿日期:2004-08-15

作者简介:唐小林(1965—),男,重庆南川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失语症、汉语批评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取得了一批颇为坚实的学术成果。在此次会议上,他进一步认为,消费社会所致的语境变迁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不止是某种研究对象或思想资源的变迁,更重要的是整个生活形态、精神生态和世界格局的变迁。研究这种变迁,是我们能够重新确立文学研究的学理依据和思想出发点的前提。具体说来,这种变迁体现在美学视野的解体和文化的变异的变异上。前者实际上宣告了从对象、机制、逻辑根据和价值精神四个方面所确立的传统文艺学知识建制的终结,后者则意味着文化的战略空间已经直接转化为经济、政治的战略空间,甚至已经直接转换为民族生存的战略空间。实质是:如何在普适学理的支撑下建设由民族知识话语所构成的文艺学——全球化时代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艺学。张骏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跨文明对话与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重建》可算是对此问题的一个正面回应。

余虹(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启蒙与现代性态度、现代性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入手,重新厘定现代性文化精神。指出:真正的现代性文化是独立自主的自由文化,其目的是对纯粹真善美的追求和对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而由政治权力控制的主导文化和由经济资本控制的大众文化,虽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却不是现代性文化本身。渐次进入消费社会的中国,迄今未能形成真正有力的自由文化,从而一直未能建立中国现代文化的张力性平衡结构,这导致了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合谋与放肆,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结构性缺失的表征。

吴兴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则发现,自“自然法的纽带”断裂之后,几乎除哈贝马斯以外的所有批判理论缺失了一个关键性环节:价值立场和事实分析之间没有规范性论证的展开。作为批判理论第三期的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批判和文化批判仍然是一种经验科学的思想样式,它对现代社会之规范性基础的误读甚至比传统的批判理论走得更远。由于规范领域的缺失,大部分批判理论家所持的价值图景都不是法理性的,而是审美主义的。社会理论需要对位准确的规范性论证和法理性批判,哈贝马斯的工作是对批判理论的结构性的拯救。

冯宪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概括言简意赅。他套用黑格尔关于“美是理念的感性显

现”,将消费时代的美学特征打趣地概述为“美是欲望的感性显现”。他通过对詹姆斯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的研究和对消费社会的现实考量认为,文化与审美已经被商业殖民。

冯黎明(武汉大学中文系)在当下的文化现象中,发现了一种“文化场”的转移动向,即概念化的意义中心转向了身体化的意义中心。这一转移背后的历史变迁,是认知型文化让位于游戏文化。游戏文化是一种符号的自我显现的文化活动,它用情绪体验替代真理,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生命经验的宣泄,而不是认知文化提供的那种对宇宙人生的客观真理的理解。文化的认知功能的丧失使我们无法在当代文学中找到能够观风俗察人伦的东西。这样,消费时代的文学证明自己的存在方式乃是告别认知、走向游戏。

徐岱(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院)也注意到消费时代艺术娱乐性的凸显。但他仍然认为,不同于一般的娱乐只是作用于人的生理感官,艺术的效应在于影响人的心灵。所以,无论如何,消费时代的艺术实践仍须张扬“精神”这面旗帜。只要艺术还以艺术的名义存在,它就不能不面对生活世界的种种问题,承担起为时代的精神世界提供能量的职责。

曹万生(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消费时代文学的人文性进行了独到的思考。他认为,文学体现的人文性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概念,具有遗传与变异的兩重性,人文性的发展是在时间维度上对空间纬度的不断开放融合而成。文学人文性在近代社会产生了消费性融入的变异,而这本身是适应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要求的。因此,他不主张对消费时代与消费有涉的文学持藐视态度,也不赞同消费时代没有文学的说法,问题的关键是对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人文性的发掘与阐释。刘朝谦(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发言大致取同一立场,他在谈到消费时代对身体的关注时说,每一次肉身的解放都是人的精神的一次性生成。马正平(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和马良怀(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并不赞同这种判断,他们认为消费文化最终消解了神圣和诗意,成为一种简化了的、肯定消费和欲望合法化的文化,其后是人性的变异。

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此意义上对消费时代文学、文化研究范式的强调与调校具有普遍意义。在他看来,消费文化也是一种市场社

会化的文化。在全球化和消费文化语境中,对文化产品的理论分析已成为国内学界的职业性生产,在生产过程中,研究者对于社会公共领域问题的揭示,在很大程度上必须进入体制内,即位于刊物和出版机构所提供的平台上才能进行言说。人们当前的考察和所能提供的历史叙事既要关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文化关系和知识生产和支配的状况,也应注意国家和区域内部的同一关系与支配状况,在关注外在空间的问题和批判对象的同时,也必须对知识界体制内部结构予以充分注意。

张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从文化研究视域里的布尔迪厄理论出发,指出消费时代,封闭的文学研究与建构社会公共空间的能力显得局促起来。文学场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被边缘化,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焦虑、徘徊和烦神之后,形式自律的“文学性”观念被动摇了。在大文化研究的语境里重构文学观,解决文学与现实历史的紧张关系势在必行。

毛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关于消费时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也切中要害。他认为应当实现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合法转变,在意识形态层面消解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集权意识,打破经院文化独尊局面。人文知识分子应该主动进入大众传媒,发掘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价值资源。实现单一的精英话语向精英、公众话语的渗透、融合、交流与互动。晏红(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对“消费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研究”的反思中,强调研究者生存方式的决定性作用。“消费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今中国文人的生存方式已经体现为一种消费化的存在。立足于此,他反思并批判了消费时代的文化与文学研究中存在的根本问题,即“人”与“文”的双重阙失和“学”与“术”的相互剥离。

## 二 现实关怀与问题研究

消费时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面临的现实问题,成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另一关注焦点。

### 1.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当下文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据称是这一话题的提出者的陶东风所代表的学术方阵与另一知名学者鲁枢元之间的论争才刚刚开始。这个话题内蕴的学术含量及其增长点倍受学界青睐。本次会议不少学者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

解,并由此形成一道学术风景线。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向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是针对鲁枢元的争鸣文章的。他指出鲁文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化约论问题,就是把本来存在差异的各种观点化约为一个或几个普遍的命题或判断,忽视了对象和问题的复杂性,乃至彼此间存在的分歧甚至重大分歧。鲁文由此而进行的“析疑”在他看来就是可疑的。在大会学术发言中,他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展开。

钟仕伦(四川大学美学研究所)对马克思的一个美学命题——“美学上的反感”进行当代阐释,发掘其内蕴的现代性意义,其目的就是要祛除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非美学”因素,敞开由其所蔽的美学的本来面目及其真正价值,使人从现代技术挤压下的“碎片”变成感性完美的人。同时亦让美学从艺术哲学回到自身,切实展开对越来越复杂的人类感性世界的科学认知。邱晓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力求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作全局性的透视和批判。其结论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可缺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野,须警惕其成为消费意识形态的合谋而不自知。傅其林(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则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本身就包蕴了消费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它是现代性逻辑发展的结果,也是现代性悖论的一种经典形式,即波德里亚之所谓“完美的罪行”。马睿(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术语不仅不贴切,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文知识的产物,是人文知识与消费时代相互介入的结果。它作为知识话语存在着明显的脆弱性、虚假性和移植性。而作为这一知识话语生产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又存在立场的不稳定性、群体的多重性和批判的有限性等问题。任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运用波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和罗兰·巴特的大众神话理论,对消费社会的审美化途径进行描述后指出,在消费社会中个体的真实性被有意掩盖,其审美状态也被有意地保留在快感阶段。阎嘉(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没有对日常生活审美化作理论上的反思,而是对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本——农家乐给予别开生面的文化解读。

### 2. 文学文本、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

在消费时代,前消费社会有文学文本、文学经

典、文学批评乃至作者、作品、读者等等人们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甚至是坚不可摧的一揽子知识性信念,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与挑战,对此进行现象学式的清理、还原和辩证,无疑是文艺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蒋荣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求证了消费社会文化的内在合法性、消费社会的结构逻辑及其文化意识形态和广义的语言学转向后认为,消费社会大量涌现的文学文本,就是以时空区隔来割断读者与文本间的实用意义联系,从而将生活事件、器物等实用文本文学文本化的实用性与文学性互为表里的文本,是一种将某种实用文本隐喻化或内涵意指化的文学文本形态。正是在这种广义的文学文本的意义上,王小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对流行时装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如今流行的暴露身体的时装,在满足人们的偷窥欲和性幻想的同时,正日益成为资本控制下的促销工具和赚钱机器,从服装发展的历史看,解放和压抑是悬在服装文化上的双刃剑。王宗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则从人物形象、叙事模式、主题、语言特征几方面对周星驰“无厘头”电影文本的特征进行了探讨。朱忠元(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以流行音乐为例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叙事策略。杨志学(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评述了消费时代的诗歌写作。杨亦军(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考察了文学文本的狂欢化与消费文化的关系。张莹(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探寻了好莱坞电影工业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联。张文涛(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以伊能静《索多玛城》为个案,以日常生活语式,疏解了审美时代,实际上也是消费时代中的表演、写作与净化的关系。

张荣翼(武汉大学中文系)关注的是未来的文学模式,说穿了是消费时代的文学走向问题。他把中国文学进入近现代以来的文学模式分疏为冲击反应模式;对抗赶超模式和翻译阐释模式。他认为这些都不是理想的文学模式,理想的文学模式应是未来的境域表达模式。

欧阳友权(中南大学文学院)却把视点放在网络文学上。他发现网络文学是消费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即是说网络文学的在线民主只是消费体制下的预设民主,网络文学写作的话语平权只不过是市场消费和资本运作机制中的有限平权。网络文学之回归民间母语的价值也是有限的,不可忽视其媚俗

时尚的亚文化书写、身体缺席的欲望叙事和削平深度的世俗文本所具有的负面效应。

李凯(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对前消费社会的文学经典的可能性命运进行了考察,认为文学经典与消费主义文化之间有必然的冲突,其原因存在于文学经典与消费主义文化在生产、流通、接受等方面的内在矛盾。文学经典被影像化是一种历史发展趋势,但仍然问题多多。

唐小林(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实际上谈的就是消费时代文学经典影像化中的一个现实问题:红色经典的电视剧改编。他在对此一文化事件的现象学还原中敞开了如下真相:民间资本投资红色经典是寻求文化权力资本的寻租;而文化权力机构与制片商之间就红色经典的争夺是因应各自的动机对剩余权力文化资本的争夺。因为,对官方意识形态而言,红色经典被消费逻辑的改造与收编,很可能是红色民族国家神话的终结。言外之意还有,在消费时代民间资本如何求得与文化资本、权力资本的共治并非易事。

周晓风(重庆师范大学)对消费时代的文学评论重新定位。他从文学评论的二重性——体验性和思想性出发,认为文学评论既可以作为知识资本,又可以作为消费对象。关于前者是说,文学评论可以成为知识形态,进而为知识资本创造新的价值;而后者则意味着文学评论主体由作者转向了读者。而读者主体的确立,则标志着文学评论多元化时代的到来。

欧震(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问题也涉及读者主体。不过他通过对读者之得以建构的历史语境的梳理,以及这个历史语境在消费时代的实际上消失,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读者已经死亡。消费时代的“读者”不过是一个空有“读者”之名的幻象。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 3. 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问题虽然没有成为本次会议的热点,但相关学者的发言振聋发聩。

曾永成(成都大学)在消费时代文学的生态关怀的发言中认为,消费时代是以物质消费为价值轴心的时代,物欲横流和占有欲极度膨胀是其基本特点。其价值追求泛滥到精神领域导致严重的“精神污染”,这正是造成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人文生态系统中,文学活动不仅是精神食粮的生产

者和消费者,同时也是极其重要的分解者。因此,消费时代的文学应当有作为分解者的高度自觉,以强烈的生态关怀履行自己作为分解者的责任。

杨晓莲(四川外语学院中文系)也感到如何消除消费时代带来的社会危机和精神生态困境,已成为当今的一个紧迫的课题。其努力的方向之一是建构现代新感性来张扬一种健康文化,重建一种健全人格和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使理想人性得以回归。她引进和研究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认为,在消费时代建构现代新感性的最根本途径是人类不断创造审美的实践活动,尤其是艺术与审美的实践活动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的审美教育。

林和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对生态家园的关注更具批判色彩。在他看来,建筑在破坏性物理机制之上的大众消费社会对人类家园的毁坏是灾难性的。个人的欲望和能量几乎可以无限制地自由表达,其结果是戕害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已到回“家”无路或无“家”可归的地步。他认为人性救助与家园重建的希望在于东方智慧的出场。

李琴(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对当代中国城市空间与生存空间变异的考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一种生态关怀。她认为,随着中国进入消费主义时代,城市空间就由有序走向了无序,由政治性走向了娱乐性,由现实性走向了虚幻性,与城市生存者颠覆权威、现世享乐、宣泄欲望的生存状态相生相克。政治控制力隐性消退,而民间组织系统又处于萌芽阶段,城市生存者的归属感遭到破坏。

### 三 传统转换与文化重建

曹顺庆及其所在的学术群体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换。但这次曹顺庆的文化视野似乎更为宏阔又更加具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前此问题符合逻辑的进一步推进。他此次谈论的是在消费社会如何实现普遍知识和异质知识的调谐,从而建设在普适性学理支撑下由民族知识话语所构成的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文艺学。这如何可能?因素多多。其中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恐怕依然是重点。对此,本

次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谈论。

李天道(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强调激活中国文化传统中重“生”、“仁爱”和“中和”的美学精神,用以重构当代文艺理论及其价值体系,重建文艺创作新的人文精神,以实现消费欲望和过度情感的“消解性控制”(de-controlled control)。

蒲友俊(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则认为原始儒家特别是孔子的思想,具有当代美学所需要的丰富资源,如民间本位、现实主义超越和审美与娱乐共融。但在其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被掩盖了、歪曲了,对其进行发掘、阐释和现代转换,就成为当下中国美学一个空前重大的历史课题。黄玉顺(四川大学哲学系)也从“生活儒学”的跨文化视域,求证了作为“形而下学”的美学之重建何以可能的问题。

申喜萍(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对中国道教文论在消费时代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审视。他通过对明代高道张三丰文论中有关“道”与“时”相联的思想、“灵性”观、人品与文格等观点的考论,阐发了道教文论在消费时代所依然具有的生命力。

马正平在向会议提交的学术论文中,重新打捞了被历史尘封了的“文”之本义,其目的仍然是要在对中华民族的精神考古中寻找消费时代文、文学、文化的新的增长点。

此外,周宪(南京大学)对消费社会中的视觉消费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消费时代,视觉已经变为一种消费,这种消费不仅对身份建构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意义传达。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提交的论文中,对20世纪德国“保守主义革命”及其后果予以审理。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提出了人像消费的正当性问题。韩云波(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对作为消费时代的大众文学的武侠小说之意义的分析,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对消费时代的畅销书的研究及价值的正面肯定,以及袁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对当代中国文化界在后现代语境中的“消解”特征和本土化的“固守”努力所作的描述与探索都颇具学术意义。

[责任编辑:李大明]